



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研究

骆 军

摘 要:北京民国政府时期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主要体现在教育宗旨、大学专业设置以及课程开设的现代化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在前期党化意识比较浓厚,在抗战期间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主要体现在:让高等教育为抗战服务;在教材方面作了较大调整:直接授予大学毕业生军衔等。由于当时中国缺乏公民文化的土壤,而无论北京民国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不是一个民主政权,这就决定了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一种无根的探索。

关键词:民国;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一、近代中国公民意识教育思想简述

近代以来,救亡与启蒙,成为中国的志士仁人探讨的主旋律。而这一阶段,很多志士都将教育与人才、教育与救国联系起来。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即是爱国主义教育。而近代把救国与教育、救国与人才联系起来,也是当时中国的时代需要。

龚自珍将公羊学原来提出的“据乱之世”、“升平之世”、“太平之世”修改为“盛世”、“衰世”、“乱世”,用清代的康乾盛世作铺垫,而把批评的锋芒指向当代的衰世。而三世的变化,龚自珍则进一步将原因指向人才的匮乏: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农、居宅无才工、工场无才匠、街市无才商、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①。鉴于此,龚自珍才发出呐喊与呼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中也同样具有影响力。他批评科举考试、批判向空疏无实发展的理学、向琐屑无用发展的汉学,提出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特别是在人才的养用方面进行改革的主张,在培养人才上要求实行尊德性与道向学的统一,教与化的统一,要求以自造自化、深思躬行的精神为学,以去人之短、成人之长的精神教人。更难能可贵的是,魏源在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从魏源论著中不难发现的爱国主义的光辉思想^②。魏源的这种学习西方的同时又不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时代意义。

严复是毛泽东所认为的“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四大代表之一。1949年毛泽东提出严复是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的代表人物^③。严复以“进化论”、“自由观”和“民本”观念作为他开“民智”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运用这些思想,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深刻地剖析了影响“民智”开启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素,探讨了“民智”发

① 阎国华、刘虹:《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0~12页。

②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五卷,第21~28页。

③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80页。

展的历史缘由,概括了以“改进民众文化结构”、“革新民众文化方式”、“提高民众政治觉悟”、“增强民众参与意识”为内容的开“民智”思想,通过加强“教育”和主张“立宪”的途径来实现对民众的智力开启,从而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他把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阐述了开“民智”思想,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更是明确无误地提出教育救国的观点。梁启超认为,“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即当道之言维新、草野之谈时务者,亦莫不汲汲注意于教育。”^①他说,“草昧伊始,蹄迹交于中国。鸟兽之害未消,营窟悬巢,乃克相保,力之强也。数千年来,……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要想开民智,则必须“立于教”。要想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废除科举为头等大事^②。

二、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一) 主动式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1915年,袁世凯颁定教育宗旨,规定国民教育为国家强盛的关键所在,需要提高民德、民智、民力。过去闭关锁国之时,封建社会的帝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愚民政策。现在“文明日启,举一切政教艺术乃至琐琐日用之微,无不由科学发明分功并进,举全国之心思才力奔凑于一途。”概括来说,中国的教育宗旨应为:爱国、诚心、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③。这些有关当时教育宗旨的法令尽管都是以大总统袁世凯的名义颁布,为袁世凯的复辟服务,但有些提法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比如,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论证方面,国家离不开个人,个人也必须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再比如,主张青年学生在学术方面要循序渐进,不要贪功冒进,好大喜功,这也符合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观点。但是,在“法孔孟”方面,袁世凯希望像封建社会一样,利用儒家思想来禁锢青年人的发展,将他们培养成袁世凯的奴才和顺民,不要过问政治,只是死读书、读死书,不允许青年人过问政治问题等等却是应该反对的。

北京政府时期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另一个体现是在当时大学所开设的专业和课程的现代化上。根据当时的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其中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理科分为数学、星学、理论物理学、试验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矿物学九门;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等等。与晚清的洋务学堂开设的专业对比一下可以看出,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大学专业设置已经比较具有现代化教育的特征了,不再像以前主要开设西方语言学以及实用性的如军事技术与军工学院类的专业,更不像旧式私塾,这实际上也是转向公民意识教育的体现。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④。通过专业的教育与训练,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才会得到加强,心理活动是人脑的机能,心理活动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发生改变,通过大脑才会反应到人的心理。在近代唯有教育才能启蒙,而要达到启蒙的效果,教育的内容——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必须要反应近代人类的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才能达到。

1913年1月12日,根据北京民国政府公布的《大学规程令》,大学哲学分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大学哲学分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开始的课程如下:中国哲学(周易、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公谷传、论语、孟子、周秦诸子、宋理学)、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论理学、认识论、西洋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教育学、美学及美术史、生物学、人类及人种学、精神病学、言语学概论^⑤。再看政治学的课程开设情况:政治学包括宪法、行政法、国家法、国法学、政治学、政治学史、政治史、政治地理、国家公法、外交史、刑法总论、民法、商法、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社会学、法理学、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交通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公法(各论)、殖民政策、国际司法、政党史^⑥。地理学专业开设的有:地理研究

①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载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59页。

②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页、第12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3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4页。

⑤《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15~116页。

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23页。

法、中国地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地理学、海洋学、博物学、殖民学及殖民史、人类及人种学、统计学、测地绘图法、地文学概论、地质学、史学概论。理科我们暂且以数学为例,当时的数学专业要求学习的课程有:微分积分学、微分方程式、函数论、近世代数学、近世几何学、平面及立体解析几何学、四原(或诸原)、概率学及最小二乘法、代数解析及方程式论、变分学、整数论、积分方程式论、理论物理学、星学、物理学实验、数学演习^①。

尽管这些课程有些并没有被完全实施,“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甚远,此等教育有不如无,因为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懂教育是什么,不过把学校毕业当做出身地步,这和科举有何区别呢?”^②但是,这些课程的开设,尤其是西方哲学的逐渐被介绍、传输,毕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促进了当时教育的现代化,一定程度促进了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提高。

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除了体现在当时教育宗旨的变化、大学专业的开设以及课程设置的现代化方面,还表现在允许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变化上。北京政府甚至还任命过女视学。这些现象表明女子和男人一样开始享有国民待遇,对于增强当时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影响及作用是不可被低估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④。思想观念的变化需要加以时日才能更加明显。

如果说以上是主动式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话,那么,“五四”爱国运动则更多的是属于被动式的公民意识教育,这种被动式的公民意识教育是由于外界的变化反应、刺激了大学生的爱国情感,从而激发起了其爱国热情,进一步增强其公民意识。

(二) 被动式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被动式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主要体现在学生反对政府卖国,争取国家、民族独立方面,这以五四爱国运动为代表。1919年5月3日,北京的一些大学的代表在北大集会,决定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当晚北京高师的工学会也召开会议,决定次日举行大示威时对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采取激烈行为。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高师、汇文大学、中国大学、高等工业学校等13所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来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承办曹汝霖(交通总长、订二十一条时任外交次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5月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同学,惩办卖国贼,6日正式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五四”爱国运动,正是启蒙与救亡相互促进的表现,在五四运动的第一阶段,青年学生是运动的主力军。

可以说,正是学生的公民意识(或者说爱国意识)才促使这些莘莘学子奋起抗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并取得伟大的胜利。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⑤。“五四”爱国运动时期的大学生比以往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更强,爱国精神更高。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一) 主动式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可能是首次在法律法规上出现“公民”、“公民教育”的一个时期。抗战前,国民

①《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19页。

②李 昱:《教育立法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1902—1937)》,同心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558~559页。

政府明确提出要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并指定公民教育的教师,编写公民教育教材。1932年,国民政府规定,初级小学不特设党义一科,高级小学也可仿照办理,所有党义教材分别纳入社会及其它各科。初级中学及高级中学,所有历史、地理及国文等课程标准应分别酌量改订,并另设科目,包括公民生活及各科所不能容纳之党义教材,此科名称拟暂定为公民科。至于大学及专科学校课程门类分别较细,其情形异于普通教育,党义一科应如何由专科以上学校课程中取消独立地位,分别归并于各科中,交由大学及专科学校课程及设备标准起草委员会详加研讨,俟有结果再行专案呈报^①。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救亡成了压倒一切的主旋律。这时期国民政府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让高等教育为抗战服务。包括协助政治部及军政部造就军事方面人才,分别担任军队之工程工作,后方动员工作,与敌人后方政治工作;与敌人占领区域秘密设置临时政治学院,以号召青年,团结人心,并为规复之准备;令各大学研究所研究军事上亟待解决之问题,专科以上学校注意战时教程,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及医药救护人才,并与必要时特设专修科,以应需要;规定学生参加抗战优待办法。各校实行导师制,并成立训导处,设置训导长或主任,以资统率,划一步骤,培养纯正思想及真实简朴耐劳之校风,并严格厉行军事管理,养成整齐严肃、操作勤敏、守纪律、负责任、明礼义、知廉耻,现代国民之美德^②。

对于大学毕业生可以直接授予军衔。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在修业期间于应修各学科外,实授国民军事教育,期满考试及格者,为陆军备役移补军官;选修有关国防军事科目,经考试及格,短期入营者,应分别请求予以陆海空军备补军官^③。另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收容流落在各地的失学大学生,通过训练,直接补充到军队中以资任用。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对高等教育的目标、高等教育的专业调整、教材的改变以及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等措施来提高大学生的公民意识,这对巩固抗日战争统一战线还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的。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亡家失国之痛深切,愿意为民前驱,参加一切救国工作,实属义无反顾”,“学生文化程度较高,爱国心特别热烈,而且过惯集体生活,便于组织,同时学生的分别极广,影响最为普遍深入”^④。

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为了拉拢青年学生,在思想方面力图对大学生进行控制,为其专制、独裁服务却应该被批判、被否定。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大学生实行所谓的“训育制”、“导师制”就是对大学生进行的思想控制。对广大知识青年的训练,就是为了信仰三民主义、信仰并服从领袖,认清只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发挥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美德,实现领袖提倡礼义廉耻之意义,涵养公诚朴实之精神。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出世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⑤。从国民政府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的所谓的训育的具体内容来看,就是要排除异己,尤其是排除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先进的马列主义对青年的思想影响,让青年学生成为蒋介石专制独裁的工具与棋子,不让他们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

(二) 被动式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被动式公民意识教育主要体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学生运动上。而这种运动往往也与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与卖国、独裁与专制相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接着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6000余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90~1091页。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114~115页。

③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124~127页。

④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138~139页。

⑤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151~155页。

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10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10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之后,天津学生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时,也大大地增强了大学生的公民意识。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事件。美军的暴行激起了全市人民的公愤,北平学生率先开展了反美示威运动,这一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得到全市人民的支持,随即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至1947年1月,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数十个大中城市,共50多万群众参加了示威游行。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加强了城市工作部的工作力量,由周恩来兼任部长,并于1947年2月发出了《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展民主进步力量,开展人民运动,促进群众斗争,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推动全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发展。同年5月4日至18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城市学生举行五四纪念会,并组织了反饥饿、反内战罢课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为反抗当局的镇压,南方与北方大中城市各学校学生冲破国民党政府的禁令,于20日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是为“五二〇”运动,它标志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贯穿当时大学生主动式公民意识教育的一个主线就是抗战救国,而被动式公民意识教育则包含着反独裁、反专制与反卖国的主线在其中。

四、余 论

政治社会本身如果不具有保护所有物的权力,从而可以处罚这个社会一切人的犯罪行为,就不成其为政治社会,也不能继续存在。只要有人被认为独揽一切,握有全部立法和执行的权力,那就不存在裁判者;由君主或他的命令所造成的损失或不幸,就无法向公正无私和有权裁判的人提出申诉,通过他的裁决可以期望得到救济和解决。因此,这样一个人,不论使用什么称号——沙皇,大君或叫什么都可以——与其统治下的一切人,如同和其余的人类一样,都是处在自然状态中。而刀剑可以立刻使一切敢于责难他的人们保持缄默^①。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引入“公民”、“国民”等概念体系,本来是近代社会政治文化重大进步的产物和表现,是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大成果,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公民文化的土壤,缺乏基本的对人的、社会的权利与尊严的关注与尊重,而无论北京民国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不是一个民主政权,都是用民主、共和来粉饰自己的专制、独裁,他们既不代表封建领主贵族的利益,又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剥削者^②。同时,民国政府又是一个通过暴力来维持其存在的政权,缺乏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土壤,这就决定了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是一种无根的探索,真正的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重任只能由本质上是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来完成了。

●作者简介:骆 军,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党委书记,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8azx009)

●责任编辑:车 英

①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3~58页。

②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页。